

童小鹏◎著

在周恩来身边

四十年

①

华文出版社

童小鹏◎著

华文出版社

在周恩来身边

四十年^上

目 录

(上册)

初识“胡公”神采	(001)
年轻的红军总政委	(001)
胜利到达陕北	(003)
平易近人的邓大姐	(006)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011)
西安事变爆发	(011)
肩负重托赴西安	(017)
宋氏兄妹参与谈判	(023)
张学良被扣留	(030)
挺身拯救危局	(035)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041)
西安谈判初见成果	(041)
与蒋介石杭州会谈	(052)
庐山谈判陷入僵局	(061)
南京谈判合作达成	(066)
建立红军联络处	(075)
抗战初期在武汉	(085)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	(085)
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097)
同叛徒张国焘作斗争	(112)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117)
武汉撤退前后	(122)
开创重庆大后方工作	(133)
组建中共南方局	(133)

2

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140)
视察新四军和东南六省	(148)
皖南事变前前后后	(153)
在延安和莫斯科疗伤	(153)
制止反共逆流	(157)
怒斥皖南事变	(166)
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	(174)
战斗在虎穴龙潭	(181)
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181)
“南委”机关遭破坏	(186)
整风运动与审干	(191)
重庆战斗又成家	(194)
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202)
林彪到重庆参加谈判	(202)
美国政府调处国共关系	(212)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225)
重庆谈判的日日夜夜	(232)
毛泽东到重庆	(232)
谈判桌上的斗争	(244)
李少石事件真相	(250)
《双十协定》签字	(255)
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262)
组建政协中共代表团	(262)
马歇尔来华调停	(266)
政协决议签字	(271)
军事三人小组巡视华北华中	(281)
为国内和平奔走	(290)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	(290)
竭力扭转中原局势	(303)
谋求东北和平	(308)
不屈服内战压力	(310)
死马当活马医	(316)

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	(321)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	(327)
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327)
运筹窑洞之中	(329)
小河会议决定战略反攻	(333)
在杨家沟制定胜利纲领	(346)
组织伟大的战略决战	(353)
从双塔村到城南庄	(353)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355)
大决战的前夜	(360)
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362)

初识“胡公”神采

年轻的红军总政委

1930年6月,红四军到长汀。我和同班同学童大统、章雄一起参加红四军的政治训练队,成了工农红军的一名战士。当时差3个月才满16岁。由于我个子小,在学校下操排队时都排在后头,有些同学讥笑我个子小还叫大鹏,不相称。于是在参加红军报名时决定改成童小鹏,名副其实。从此,大鹏就成为小鹏,一直沿用至今。

1932年春,我在红四军政治部任秘书。听说周恩来于1931年底已经离开上海党中央,化装经过广东、福建秘密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周恩来在进苏区前就蓄了长胡子,到瑞金后一直留着,所以有人叫他“胡子”,但大都尊称他为“胡公”。这个代名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直到建国后一些老同志私下谈到周恩来时,仍称“胡公”,尽管他的胡子在西安事变后就剃掉了。当时,红军中大多是十几岁的“红小鬼”,把长胡子的都看成是老年人,我认为周恩来一定也是老年人了。

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那时我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一直在前线,没有机会看到总部首长。同年10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调回瑞金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后来才知道,是受“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批判,排挤他对红军的领导),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就叫周恩来为“总政委”,但私下里仍常常称他“胡公”。

1933年2月底,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乐安、南丰之间,打了大胜仗。先在黄陂附近,一举消灭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蒋介石嫡系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师长李明因伤被俘,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被

001

活捉。3月下旬,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十一师大部,从而胜利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虽然被临时中央调离前线,但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改变中央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南丰城的指示,仍运用毛泽东集中红军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因而取得这次伟大胜利。这使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们认识到周恩来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军事家,他在红军中的威望更高了。

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失败后,接着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我红军主力利用蒋介石准备新的“围剿”的间隙,在永丰、广昌之间以藤田为中心的地区,休整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总结作战经验,进行政治教育;一方面扩大红军,进行部队整编。为此,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24日召集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进行动员,朱德、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我当时已调到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工作,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曾多次见过朱德,他还是和过去一样,朴实得像个“伙夫班长”。在这次会议上,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看见周恩来总政委。他和大家一样,头戴五星军帽,身穿褪色灰军衣,腰围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草鞋。对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人们早已熟悉,所以,他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眉毛粗黑,目光炯炯,两腮和上唇、下巴都长着粗黑的胡须,英俊而又严肃,腰杆挺得笔直,一派军人的气概。从脸上的胡须看,像是50岁的人,可是奕奕的神采又像是二三十岁的英俊青年。周恩来亲切注视着大家,就像一块强磁力的吸铁石,立刻把在场干部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身上来。台下都在惊奇地窃窃私议,这就是有名的总政委周恩来——胡公吗?

朱德宣布开会了。他知道许多干部都没有见过周恩来,就向大家介绍说:多年来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大革命时期,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现在他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我们请他作报告。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以洪亮高亢的声音作了长篇报告。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红军当前的任务,讲到部队整编的目的。1000多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被他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和从容不迫的风度所吸引。每讲到精彩之处,会场上则是掌声如雷。报告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这个报告,对于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对于部队整编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大报告,印象极深。当天,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早饭后,排演要到总政治部比赛的话剧。十一时出发到总政参加干部会,周恩来总政委作了四个钟

头的报告,内容是:红军整编的意义与今后工作及扩大红军的伟大成绩。报告极为周密详细。”这天,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

为了庆祝“八一”红军建军节,并检阅部队整编后的素质,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决定,一方面军7月31日在总部驻地东沙陂举行运动大会,以团为单位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项竞赛,军团和师直属队也参加政治、文化和演剧比赛。8月1日,举行阅兵、授旗、授勋等典礼。8月3日,运动会结束,给优胜单位发奖旗。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自始至终参加和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几天来,大家同周恩来熟了,逐渐解开了一个谜,听领导同志说,周恩来才35岁,难怪他那样神采奕奕啊!许多同志都觉得这样的年纪,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现在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真是了不起的人才!

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军事保守主义,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仓促退出中央苏区实行长征。

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听传达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会上,改组了中央的领导,剥夺了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以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面的军事行动。朱德仍以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作战指挥。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团结一致,冲破了蒋介石大军的阻击、包围,战胜了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打破了张国焘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阴谋。1935年10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中央负责同志。听说在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重病,发高烧,肝脏化脓,大家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心。他躺在担架上还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

1935年10月,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后,听说周恩来的病好了,大家都很高兴。11月,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

003

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大家就叫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不叫总政委了。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起指挥了直罗镇战斗,歼灭了向苏区进攻的东北军一〇九师及一〇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12月8日,周恩来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到达陕北安定县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与组织全国革命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率领下,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经过七十五天的行军作战和宣传工作,于5月初胜利回师陕北。在此时期,周恩来和博古、邓发三人留在瓦窑堡组织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和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央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高中级干部到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战术。毛泽东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授课。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务长。陈光、罗荣桓、谭政等高级干部,一面在学校工作,一面参加学习。我也奉调去学习,当然是喜出望外。1936年5月18日,我离开度过六年战斗生活和培养我成长的红一军团,于5月20日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红大学生按职务和有关条件编成一、二、三科。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职务不够团级,却被破格分配到师团级以上干部的第一科。从此,我就有更多机会看到中央领导同志,并听他们作报告和讲课了。

5月21日,中央党校邀请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红大的学生都去旁听并做了记录。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日本各派侵略中国的策略,清楚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变动,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等,并根据1935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特别说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只有团结一切爱国的力量参加抗日斗争,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他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以1934年在中央苏区时拒绝同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以致十九路军遭到失败,我们反第五次“围剿”也遭到失败的教训,说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性。他解释将苏维埃工

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我党提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意义等等。从这次报告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帮助我们提高了对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在分组讨论时,大家更感到过去在战争中学习得太少了,这次调到红大来学习是极宝贵的机会,应该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准备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做出更大的贡献。



红军大学第一科学员摄于保安县(现志丹县)。左上方戴眼镜的是罗荣桓,他的右边是杨成武;前排右为刘亚楼,左为萧文玖;背雨伞指挥唱歌的是彭加伦,彭的对面是童小鹏。(1936年7月)

27日,大家特别兴奋,周恩来副主席到红大俱乐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了。他根据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以及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他特别强调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中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号召同志们要努

005

力学习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准备在抗日运动高潮到来时,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小组讨论时,大家都认为周副主席讲得透彻,解决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难问题,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平易近人的邓大姐

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为准备开学典礼和游艺晚会,全校放假一天。为防备敌机轰炸,开学典礼大会于下午五时在南门外举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亲自到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主要讲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学校的任务。当他最后讲到,“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时,全体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张闻天主要是讲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掌握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周恩来主要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爱国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当天的晚会开得很热闹。有李克农导演的活报剧和双簧;有陕北歌舞团的唱歌跳舞;我还参加了红大演出的话剧。每个节目都得到热烈的掌声。大家对跳舞特别感兴趣,看完后还要“再来一个”。节目演完后,李克农、罗瑞卿等领导同志陪着一位大姐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她亲切地和大家握手,称赞大家演得好。李克农向大家介绍,这位大姐就是中央局的秘书长、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当罗瑞卿特别把我介绍给邓大姐,说我一军团的老演员,曾扮演过宋美龄时,邓大姐有点惊奇,又来同我握手,顿时我脸红了,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她那慈祥的面孔,热情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陕北歌舞团有几个少女)留下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小超”(周恩来及一些老同志对邓颖超的称呼)的名字我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听说过,这次晚会上是第一次同她见面。几天之内连续听两次周副主席的报告,又在一起开晚会,还同他的夫人交谈、握手,对他们的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

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驻东线绥德、清涧的中央军也配合进攻。当时我党和东北军已有联系,中央决定撤出瓦窑堡,主动让给东北军,以便张学良向蒋介石交代。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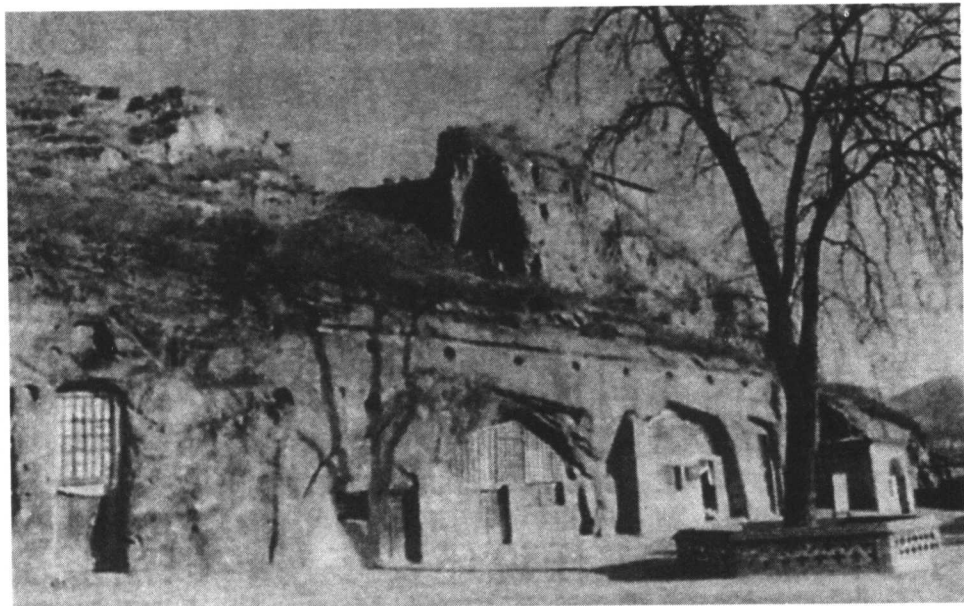
抗击东线中央军和组织中央机关有秩序地向保安撤退。为争取准备时间,6月14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立即将部队南撤。19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央机关撤退时,驻在北线横山的陕北地方势力高双城,派一个营于6月21日突然袭击瓦窑堡我中央机关。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大学和中央警卫部队还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保安。因时间仓促,除人员全部安全撤退外,遗弃了一部分从山西运来的布匹。周恩来又指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同时要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李克农同王以哲商量好后,就带了中央联络局的干部卢伟良、王立人和保卫局的几个侦察员,一个保卫排,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双方都朝天放枪,我们且战且退,东北军且战且进,一直进到瓦窑堡城内。因为他们是奉“蒋总司令和张副司令命令”进驻的,所以高双城部队只得撤出去。红军部队也就撤到自己的防地。瓦窑堡就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这是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去肤施(即延安)秘密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随后,中共中央迁到保安(今志丹县)。

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因长期遭受战祸和天灾,城墙已残破不堪,没有一条成型街道,只有一些零落的小店铺,山边有许多石窑,居民多半住在这里面,根本不像个县城,大家进了城还打听“保安还有多远”。常常有人这样形容县城之小,“小小xx县,三家豆腐店,城里打板子,城外听得见”。而保安连一家豆腐店也没有。可是这里是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故乡,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后方,它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为临时的红色首都。

在陕北这座小小的县城里,住着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夫人贺子珍就住在两间石窑洞里,里间是宿舍,外间是办公室。外面有一个院子,周恩来在靠西边院墙的一间小平房里居住和办公,房内只有一个小土炕和一张小办公桌,两个木凳子。邓颖超白天在中央局办公,吃饭和睡觉才到这里来。叶剑英参谋长的“官邸”,是利用小门楼改建的。住在附近的还有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因蓄有八字胡,大家叫他“小胡子”,以别于“大胡子”周恩来)、作战科长伍修权等。张闻天、博古和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员,住在东边的石窑洞里。

007



毛泽东 1936 年秋、冬在保安（现志丹）居住和工作的两个石窑洞。左边的小窑洞是叶子龙、李质忠、童小鹏和军委机要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8月13日，这天上午我上完课，林彪校长突然告诉我：“毛主席找你谈话，要调你去工作。”我真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快要吃午饭了，我就说：“下午我去。”下午3时，我先找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军委机要科长叶子龙，我们在瓦窑堡时就认识的。他把我带到毛泽东办公室。一见面，毛泽东劈头就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二局工作？”这一问，使我马上捏了一把汗，面红耳赤，无以回答。他继续说：“分配了一件工作不能够随便不做，如大家都这样，那就连仗也打不成了。如果煤炭工人都不去挖煤，那所有的轮船、火车、工厂也就不起作用了。二局的工作并不怎么苦，就是苦，为了革命也是要忍耐的。红军应有它的纪律，不能任自己去挑选工作……你是很好的同志，还是青年，前途远大，应该知道这些。……现在调你在这里工作，当秘书，你还可以去红大听课。”当时我懊悔，不该提意见离开二局回红大学习。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毫不迟疑地回答一声：“好！”就低着头退出门。我又到叶子龙那里，告诉他毛主席批评我了，明天我就来上班，希望他多帮助我。

这天从一科调出的人,除我以外,还有张纯清、张经武,他们两人是调到西安做统战工作的。晚上,罗瑞卿教育长在保卫局为我们三人饯行,杜理卿作陪。晚饭后,大家高兴地在一起聊天。我给他们说挨了毛主席的批评,感到懊悔,不该要求离开二局。罗瑞卿说,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评,是好事;现在又到他身边工作,那更是幸运的事,要努力工作,还要好好学习。罗瑞卿是我的老领导,对我的关心和鼓励,使我心里暖烘烘的,我对他表示感谢,挨毛主席批评产生的紧张情绪也就松弛下来了。

8月14日,我离开红大一科,搬到军委机要科。机要科在西边一个宽大的石窑洞内,有七八个“红小鬼”在译电。从此,我就成了毛泽东的秘书了。来到毛泽东身边两天了,毛泽东还没有叫我去,我也不好自己跑进去。他还是什么事都找叶子龙。我问叶子龙,我这个秘书怎么当?他也说不清,只是说,他不叫你,你就在机要科帮助校对电报,抄存电报。我当然高兴,这样就不会失业了。所以以后有些老同志开玩笑说,我是毛主席的“名誉秘书”,实际上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的秘书。这倒是合乎事实的。

我和叶子龙、李志忠(现名李质忠)三人在石窑洞里的一个小土炕上,白天在小炕桌上办公,晚上拿走炕桌就睡觉,简单方便,可是盘腿坐在炕上很不习惯,盘坐不久就要下来伸伸懒腰。同志们开玩笑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这里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很多,散步、上厕所都能碰到,特别是去小便池还要经过周恩来的门口。

李志忠1931年就是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译电员,他同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担任苏区中央局和上海临时中央无线电通信的密码翻译工作。1932年邓颖超从上海到了瑞金,担任中央局秘书长,领导机要工作。听李志忠说,党中央的第一部秘密电台,是周恩来1930年在上海中央时亲自建立的,当时只通香港,因为中央苏区还没有电台。1931年红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电台后,就正式同上海中央通报了。我党第一本高级密码,是周恩来创制的,并用他的代名“伍豪”来命名叫“豪密”,是1931年任弼时带到苏区中央局的。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性格比较懦弱,一见中央领导同志就很腼腆和羞怯,不敢讲话,有时替叶子龙送电报,一送到就赶快离开。开始见到邓颖超大姐也是要脸红的。因为她平易近人,特别关心我们这些“小弟弟”,又常在晚会上一同参加演出,接触多了,也就习惯了。她是女同志中比较活跃的,在晚会上常常被点名唱歌,她喜欢唱《毕业歌》、《摇篮曲》

009

010

等。她还和王立人副官演过李克农编导的独幕话剧《姐弟》，剧中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同时又侮辱日本妇女的罪行，深受同志们的欢迎。当时我身体很弱，经常患病，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住进医院，邓颖超还派人送来慰问信和慰劳食品。那时大家都很穷，保安又买不到东西，得到一点大米、馒头就很高兴了。

1936年9月30日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同叶子龙一起校对电报时，邓大姐忽然亲自送来两个月饼，说是炊事员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做的，我们在加夜班，特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她开玩笑说，一个给弟弟（指叶子龙），一个给妹妹（指我）。真搞得我们“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除感谢外，面红得说不出话来。她所以叫我“妹妹”，就是因为她看到我在话剧中扮演过女角。当时红军中女同志很少，演剧时他们常推我演女角，勉强“把黄牛当马骑”。大姐叫我“妹妹”，当然是开玩笑，但也表现出革命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情谊。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

1936年夏天,自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和中共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以后,三方面都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采取各种方式“逼蒋抗日”。

可是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地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虽然派代表同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仍然集中力量布置“剿共”,对张、杨和中共的关系则通过特务加紧侦察和破坏,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镇压,毫无抗战的实际行动。



蒋介石(左一)到西安督师“剿共”,张学良(前排左四)、邵力子(前排左三)、杨虎城(左二)等到车站欢迎。(1936年12月)

011

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唐明皇和杨贵妃玩乐、洗温泉浴的地方),加紧进行“剿共”布置。他调集“剿共”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万耀煌、陈继承、陈调元等到西安“督战”。蒋的嫡系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的战斗机,也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大规模内战的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直接找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师长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蒋单独召见王以哲说,已知道他的电台与共产党通报,警告王要服从命令。



蒋介石在陕西临潼华清池的住处——五间厅。(1936年12月)

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已知道蒋介石准备了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第一方案是: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蒋介石已内定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在这个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密商对付办法。他们都不愿意执